

十子名言译评之十

B229.95-
G78

晏子名言译评

关立勋 编著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晏子名言译评/关立勋编著. -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2.1

(十子名言译评/关立勋等编著)

ISBN 7 - 5075 - 1272 - X

I. 晏… II. 关… III. 晏婴 (? ~ 前 500) - 哲学思想
- 研究 IV. B222.9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6857 号

华 文 出 版 社

(邮编: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网址: <http://www.hwchs.com>

电子信箱: webmaster@hwchs.com

电话 (010) 83086853 (010) 66035914

新华书店经销

东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00 千字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4000 套

每套定价: 99.00 元 (共 10 册)

前言

—

晏子，本名晏婴，一名晏平仲，春秋末齐国莱地夷维（今山东高密）人，约生活于公元前 570—前 500 年，约与老子同龄而大孔子二十岁，大孙武约四十岁，早于墨子约一百年。晏子记载于《左传·襄公十七年》和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，南宋郑樵《通志》撰有较详传记。

晏子父为齐卿，即桓子晏弱，齐灵公二十六年（公元前 556 年）晏弱卒，晏婴继任齐卿。晏婴一生臣侍三代齐侯，即灵公、庄公、景公。齐景公四十七年（公元前 500 年）晏子去世，此时，孔子正任鲁国司寇，老子已出函谷关约十年，孙武入吴十二年，已与伍子胥共率吴军大破楚国。

晏子故里在今山东高密，封地在晏城（今山东齐河县），其墓地在临淄城北 3 华里，即今淄博市东北 50 华里，临淄南即为管仲墓，再南即清代小说家蒲松龄故居。

《晏子春秋》记述了晏子一生的言行，但该书并非晏子自撰。关于该书的作者、成书年代及思想体系等问题，汉代以后一直纷争不已。学术界较为共同的想法是：《晏子春秋》不是晏婴自撰，作者并非一人，写作并非一时，作者应是齐国史官、晏婴门人后代或其它各派学者，其中也包括长期在民间流传的有关晏子的故事。该书最后由一人

或少数几人加工润色而成，成书年代约在战国中后期，不会晚过秦统一中国时。

《晏子春秋》之名，最早见于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，西汉后期刘向据内库所藏 38 篇 838 章的版本，整理为 8 篇 215 章，遂成后世流传定本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亦据此称“晏子八篇”。此书历代流传，至元代首出刻字本，该版本至清代亡佚，明清有几部刻本传世，其中明刻字本中绵眇阁活字本为《四库全书》所收。

对《晏子春秋》一书，历代皆有评议以及校注，其中包括各种为晏子所写的传记、晏子事迹的评论、晏子思想体系的讨论、《晏子春秋》一书的考证、各种版本的序跋等等。清代以后较好的读本为近人张统一的《晏子春秋校注》以及今人吴则虞的《晏子春秋集释》。后者集校注完备，前者则每每于注中提出自己的见解，多有可贵启示。

二

关于晏子的思想体系问题，应该说，晏子非儒更非墨。

百家争鸣是战国时期的事，晏子生活在春秋末，尚无争鸣之事。晏子去世时，孔子只是鲁国司寇，尚未周游列国，也未成一派；至于墨子，晚晏子一百年，更谈不上晏子属墨家。历代学者称晏子为儒者或墨者，是从晏子言行中看到后来儒墨的影子，实际上这是作为政治家、社会活动家的晏子对儒家、墨家的影响，正如早于孔子一百五十年的管仲，其言行实践对后来的儒家、法家等均有影响，但不能称管仲是儒家或法家一样。

晏子思想是独立的,是在他长期执政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,但他的思想谈不上形成了某种思想体系,这是因为:

第一,晏子是杰出的实践者,他一生忙于处理甚至补救各种事件、问题,追求的是妥善、圆满的结局,国家局面的稳定,君臣关系的协调,国际交往的融洽。他是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,不是哲学家思想家,他的一批著名理论观点,也是在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,是处理各种事物中形成的。

第二,晏子一生侍奉三位齐国君主,而三位君主思想、品德、作风都不一样,这使晏子不能以一套固定不变的思想或理论去一样地对待,政策、思想、措施有所变化是必然的。他侍奉齐灵公三年,侍奉齐庄公六年,侍奉齐景公四十七年,灵公未重用,庄公时时不听,只是在齐景公时期,晏子才逐渐形成处理各种事物的规律,形成对各种不同事物的看法,有了各方面比较固定的认识,但相对后世诸子百家来说,晏子还谈不上什么自己的思想体系。

一个需要处理全国各种复杂事物的政治家,不可能只凭一种思想去工作,这是晏子的思想没有什么独立体系的重要原因,也是后来战国诸子百家代表人物没有人能长期担任一国宰相的原因。

三

晏子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,是个实事求是的唯物论者,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,特别是主持实际政务的宰相一级的官员必备的条件和水平。如果君臣都是唯心论的、

形而上学的，那必是一个混乱朝代，一个国家难于发展的时期。

“和同之别”是晏子的著名论断，是在治政问题上的辩证观点。他提出：君臣之间应该“和”而不应该“同”，“所谓和者，君甘则臣酸，君淡则臣咸”，“君甘亦甘，所谓同也，安得为和？”（内篇谏上，见本书第14条）君臣互补而使国家得到治理，这是“和”即和谐，而那种对君王曲意逢迎、趋同以邀宠的丑行都叫“同”。上有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作风，下必有谄媚求同的奴才品格，君臣都应辩证地认识真心辅佐、不同意见、直率批评这些问题。

对于数量与质量的辩证观察，晏子更是极通俗地指出：“五子不满隅，一子可满朝。”（外篇，本书130条）五个儿子站不满房间的一个角落，一个儿子却可以誉满朝廷——不在多少，而在质量！不好的儿子，再多也没有用；好儿子，有一个就会使人满意。家庭如此，国家也如此。某种事物比如精明强干，也要辩证地看——有精明强干的兄弟和部下，应该万无一失地保住江山社稷了吧？可是，夏桀之兄有夏桀这样的弟弟，却被夏桀赶走流亡了；夏桀有商汤这样能干的臣下，夏朝却亡在商汤手里而改朝换代了！（外篇，本书146条）什么人可以依靠，真应该辩证地想一想了。

治国需要智者，但究竟什么是聪明、什么是愚蠢？晏子提出很著名的论断：“圣人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愚人千虑，必有一得。”（内篇杂下，本书116条）此语后来被司马迁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写成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必有一得”而广为流传，这是对智与愚的很好的辩证——看

待任何问题都不应绝对化,否则智者会从千虑一失变成千虑多失,也就成了愚者。和智愚问题一样,“不肖者自贤,溺者不问坠,迷者不问路”(内篇杂上,本书 102 条)。贤者与不肖者,善泳者与溺水者,识途者与迷路者之间,都没有绝对界限,自以为是、自以为能,就会使问题性质转化,这就是辩证法。

生与死的问题,对所有的人都是考验,求生畏死是人的本能。但是,“盛之有衰、生之有死,天之分也。物有必至,事有常然,古之道也。曷可为悲?至老尚哀死者,怯也!”(外篇,本书 126 条)指出生死是自然规律,这并无新鲜处,但晏子此段话使人振聋发聩在“至老尚哀死者,怯也”——说得多么好,多么有境界!老而不怕死,是尊重自然辩证法。尊重客观规律,并能按照客观规律安排自己生活、支配自己心态的人,也就是懂得辩证法的人,将永远积极乐观。

四

重视民众,以民为本,并以此为制定政策的基础,这是晏子重要的思想方针。

春秋末年,奴隶的普遍逃亡与反抗,使大多数奴隶主被架空,甚至导致一些诸侯国灭亡;生产关系大变更,使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。因此,这时期进步的思想家、政治家甚至部分诸侯也认识到人民的力量,“以民为本”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,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理论,晚于晏子二百年的孟子将这种思想经典地概括为“民为贵,社稷

次之，君为轻”，对后世影响极大。而“以民为本”这四个字却是晏子提出来的。

晏子多次阐述以民为本的道理，强调无论何时都要紧紧地和人民在一起，他说：“卑而不失尊、曲而不失正者，以民为本也。苟持民矣，安有遗道？苟遗民矣，安有正行焉？”（内篇问下，本书 87 条）地位低下却能不失尊严，处境委屈却不失正直，就是因为把人民作为根本。紧紧地和人民在一起，就不会有被抛弃的原则，不和人民在一起，就不会有正直的言行。

晏子的爱民，当然是从稳定社会秩序出发，因此，他提出了一系列能使人民满意的政策，例如要求统治者节俭、薄赋、减役、轻罚、省刑等。他要求“节上而美下”（内篇谏下），即要求上层人士节俭而使普通百姓富裕；他甚至警告说“穷民财力以供嗜欲谓之暴”，是“守国之大殃”（内篇谏下）；他提出对极富的一小部分人要进行财产限制，“富，如布帛之有幅焉，为之制度，使无迁”（内篇杂下），国家应建立制度使贫富差距不至于太大。

以民为本不仅要求统治者有爱民之心，还应该有切实之举，减轻赋税和徭役就很现实。晏子主持朝政，很注意这件事，他说：如果税收很重却不返还给人民办事，浪费财富与身边的人取乐，无视小民的忧愁，如此，国家真是没希望了。国内孤寡老人受冻挨饿，国王的狗死了却举行祭奠仪式，鳏夫寡妇得不到帮助体恤，国王的狗却死有棺材，行为政策如此邪僻，百姓怨怒，诸侯歧视，这就绝不是小事情了。（内篇谏下，本书 41 条）晏子提出减赋恤民的同时，还提出奖赏臣民的政策：“以谋胜国者，益臣之禄；以民力胜

国者，益民之利”，即凡以谋略使国家获益者，就增加俸禄；凡以力量使国家受益的百姓，就增加奖赏。“君上享其名，臣下利其实”，想办法为人民谋实利，就会使“用智者不偷业，用力者不伤苦”（内篇问上，本书 48 条）。充分调动了智者和劳力者的积极性，何愁社会治理不好？

减刑少杀，也是晏子重民、以民为本的重要内容。齐景公用刑滥，动辄下令处罚处死各种他所不满的人。《晏子春秋》多次记载晏子力阻滥刑无辜之事，例如“内篇谏下”所载谏诛犯槐树者、谏囚斩竹者、谏诛挾冶之兵、谏改籍重狱多；“内篇谏上”记载的谏诛骇鸟野人、谏诛围人，“外篇”记载的谏诛断雍门之橦者等等。晏子甚至以自己在市场上了解到的“屨贱踊贵”（鞋子难卖而假肢卖得快），坦言刑罚过多，以至砍脚人多而使市场上假肢供不应求。（内篇杂下，本书 83 条）晏子的警告申明了一个道理：靠砍脚维持政权，砍掉的是自己政权的根基，暴政不能持久，使人民无法生存下去的政权，自己首先就不能生存。

当然，以民为本，无论是晏子还是后来的儒家，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，为了使人民不至于始终处于与朝廷敌对的立场上，他们当然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，更不是从人权的立场出发，认为每个人都享有平等权利，这是不能美化的。事实上，不用说当时还是奴隶制社会，即使到了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里，也并非人人意识到应该享有什么权利，也不是每个政权都愿意给每个公民以应有的权利。频频的罢工、斗争以至起义、革命，绝大多数不过仍是在争分配上的平等，是在呼唤重视普通人民群众这个群体、阶层，而不是注重每一个个人

的权益。民本不是人本，民本主义不是人权主义，晏子当然不会想到这些。

五

国家的治理，用人政策是首要问题，因此，从政五十余年的晏子面对每一位君王、面对每一次贤佞之争的问题，都明确声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：举贤去佞。

要重用贤臣，晏子对此给以极重的强调：“国有三不祥，……有贤而不知，一不祥；知而不用，二不祥；用而不任，三不祥。”（内篇谏下，本书 27 条）有贤人而不知、不用、不授重任，竟是国家之三不祥，原因就在贤人能使国家与事业昌盛，而小人只会使国家与事业败亡。面对齐景公之问，晏子提出的“任人之大略”是“谄谀不迹乎左右，阿党不治乎本朝”（内篇问上，本书 71 条）。身边绝对不用谄谀小人，绝对不允许臣下结党营私——这是多少朝代腐败甚至动荡的根源。晏子的忠告有沉重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。

何为贤人？标准是什么？晏子提出“察人”的标准和方法是：“通（通达显赫时）则视其所举（举荐、重用），穷则视其所不为，富则视其所分（财产处置），贫则视其所不取。”（内篇问上，本书 59 条）与贤相反的是佞，贤者与佞人的区别，晏子用了较长的篇幅予以描述（见内篇问上，本书 68 条），晏子认为，奸佞之人的最大特征就是两面派——对上一套，对下一套；公开一套，暗地一套；表面一套，心里一套；说的一套，做的一套。心地极端自私、卑鄙、贪婪、奸诈，表演却是清廉、光明、公正、坦诚的样子，越是在上级面

前,在关键时刻,他们的表演就越是卖力。而这种奸佞小人往往仕途顺利、飞黄腾达、不可一世。

为什么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奸佞小人?晏子一语破的:“上无骄行,下无谄德。”(内篇问,本书64条)在上位的人骄横专断,则下面必有小人迎合谄媚。贤者忠言总是逆耳的,小人的阿谀总是甜蜜的,于是奸佞小人总是得宠。得宠的小人绝不仅仅是求得被宠而已,他们一定会恃宠作恶:掠夺财物、谋害贤臣、结党营私、左右君王甚至颠覆政权,而也正是因为在上位的人信任他们,所以贤臣君子与他们的斗争也就格外吃力,有时简直是束手无策。

这种因为君王保护而得宠又得不到制裁的情况,被晏子极著名地比喻为“城狐社鼠”和“狗猛酒酸”(见内篇问上,本书50条、55条)。城上的狐狸、庙里的老鼠,不打是祸患,打又怕伤了神像,伤了建筑,于是贤人君子不得不投鼠忌器。卖酒的养凶狗,酒再好,顾客也不敢登门,以至于酒酸货败。这城狐、社鼠、猛狗,指的都是奸佞小人、受宠权臣。这种不正常的君臣上下关系,给国家和事业带来的损失以及灾难,历史上真是并非鲜见。“社鼠之患”与“狗猛酒酸”的比喻,也见于《韩非子》等书,“城狐”则出于《晋书·谢鲲传》。在中国古代作品中,这些都成了尽人皆知的成语,屡屡见用,可见代代都有城狐社鼠之患,而代代又都有投鼠忌器之叹。

举贤去谗,并非易事。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社会里,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,因为没有监督机制。狗仗人势的时候,打狗就不得不看主人;老鼠藏在神坛里时,投击老鼠就不得不顾忌神器;权力比法律大的时候,抓捕

坏人也必然受到掣肘甚至阻挠,不得不无奈地面对背景势力和影响。这种真理与现实的矛盾,令人尴尬而束缚手脚,而彻底解决这种问题,绝不是如晏子那样一次又一次地去堵漏洞,而是应该从体制上改革,当然,这就不能苛求于晏子了。

六

晏子有突出的以礼治国的理论与实践。

礼,包括礼制、礼法、礼仪、礼节、礼貌等全部在内,其实质就是区别并维护上下远近关系的准则。礼的加强,就是统治秩序的稳定;礼的废弃,就是社会动乱的开始。因此,无论什么朝代,统治集团无不在治国之策中给礼以高度重视。晏子在其从政五十余年的时间里,所持治国之策就是礼法并重,其中以礼治国的思想十分突出,对其后的儒家影响很重。

对礼的本质和作用,晏子的认识很明确:“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,与天地并立。君令臣忠、父慈子孝、兄爱弟敬、夫和妻柔、姑慈妇听,礼之经也。君令而不违,臣忠而不二,父慈而教,子孝而箴,兄爱而友,弟敬而顺,夫和而义,妻柔而贞,姑慈而从,妇听而婉,礼之质也。”(外篇,本书 135 条)晏子强调:“上若无礼,无以使其下;下若无礼,无以事其上。”“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,以有礼也。人君无礼,无以临其邦;大夫无礼,官吏不恭;父子无礼,其家必凶;兄弟无礼,不能久同。”(外篇,本书 124 条)晏子特别深刻而通俗地指出:“夫勇多则弑其君,力多则杀其长,然而不敢者,

维礼之谓也。礼者，所以御民也；辔者，所以御马也。”（内篇谏下，本书43条）

为了以典型事例贯彻礼治，晏子制造了著名的“二桃杀三士”事件（见内篇谏下，本书42条）。公孙接、田开疆、古冶子三人勇力无比而不拘于礼，恃勇无礼于其他大臣，于是晏子使国君以二桃奖三士，使三人争功不让之后又自惭而接连自杀。三人均死，朝中少了危险因素，无礼之人也从此受到教训。当然，三人是否当死，值得商榷，从三勇士自杀前各自所谈来看，至少他们还有知耻之心，应属于可教育和可利用的对象，杀了太过分。也正因此，由这件事衍化的成语“二桃杀三士”的意义，后世竟演变成用阴谋手段借刀杀人的比喻，这一定是晏子始料不及的。

以礼治国必须与以法治国相结合，否则，光靠礼治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。这礼与法的关系，或法的重要性，晏子强调得不够，他更多地是在执政实践中立法，既无完整法治理论，所定之法也缺少系统。

礼，只是一种约束力。礼是一个国家、民族、地区道德水准的表现。但是，礼的实现基本上是靠每个人的觉悟，靠自觉，因此，许多问题或对某些人来说，礼与道德无能为力，所以国家与社会的管理，必须有法律规定，甚至靠法律强制执行。任何社会都必须礼法结合去治理，不能用法律判决的事物大量存在，只能靠礼与道德去约束和教育；但许多问题是礼与道德无能为力或本该由法律治理的，就必须立法执法。一个真正进步的社会，自然应该有很好的礼仪道德，但首先必须是法治社会。法律治理与礼的教育应该永远互补地成为治理国家的工具，这也是晏子给后人的

启示。

七

晏子强调忠君与爱国的区别,这是应该特别提出的。

自汉代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之后,“忠君即爱国”的宣传即深入人心,多少诤臣勇将在明知君王昏庸谬误、自己言行有利于国家的情况下,仍然只能服从君王,甚至出现了岳飞冤死风波亭的悲剧,给后人多少遗恨!但是,这种“忠君即爱国”的思想,在春秋及战国时代并未形成,人们并不以此为然,相反倒是认为对昏君暴君没必要忠,可以抛弃,甚至可以指责。晏子在这方面的言论和实践,可以说是态度鲜明并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极大。

晏子在任时,齐国发生了一件震动诸侯的大事:齐庄公被大臣崔杼杀死。围绕这一事件,晏子的态度在当时及晏子去世后一直被争议。齐庄公勇武好战、刚愎自用且好色,晏子几次劝谏不听,于是辞官返乡。之后,即公元前548年,齐庄公多次与大臣崔杼妻私通,终于被崔杼及其家丁箭射刀砍而死,陈尸院中,同时,几个随侍庄公的人也被杀,赶来的两个史官被杀,又有几位朝臣闻讯自尽殉死。晏子闻知,赶到崔杼家府门前。此时,有人问晏子:是否想为庄公殉死?想不想出国逃亡?又有人问崔杼是否把晏子也杀掉?面对这种惊险局面,晏子的言行表现颇富传奇色彩——

晏子首先回答:“君为社稷死而死之,君为社稷亡而亡之。若君为己死为己亡,非其私匿,孰能任之?”这就是说,

如果国君是为国家死难或逃亡的，则忠臣可以为其殉死或追随逃亡；如果国君是为自己私事死的，臣子就没必要殉死。“以亡为行者不足以存君，以死为义者不足以立功”，跟随流亡，并不能保住君主；殉死称义，也无助于国。（见内篇杂上，本书 97 条）回答问题之后，晏子走进崔杼府院，伏庄公尸体大哭，哭毕，出门而去，崔杼手下人欲杀晏子，被崔杼制止。此事详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。

晏子曾先后侍奉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三朝，当时人多有疑问，认为三公人品、作为、性格、结局都不相同，晏子何以都能侍奉且无伤自身？庄公之死，晏子不殉，更是有人诘难。若干年后，面对诘难，晏子仍说：“言不用者，不受其禄；不得其事者，不与其难（死难）。”（外篇，本书 139 条）孔子曾称赞晏子：“救民之生而不夸（夸耀），行补三君而有不居功，晏子果君子也。”（《晏子春秋·外篇第七》）

侍奉君主的原则，晏子提出“逢有道之君则顺其令，逢无道之君则争其不义。故君择臣而使之，臣虽贱，亦得择君而侍之”（内篇问上，本书 75 条）。晏子对当世君国关系也一样评价：公元前 528 年楚国与吴国的乾溪之战（今安徽亳州），楚灵王耗尽民财，战争无度，民怨内乱中其弟楚平王篡位，灵王只得自缢于乾溪，死后楚人不准运灵王尸体回都城，此事，晏子站在谴责灵王的立场上（见内篇谏下，本书 25 条）。

最使人印象深刻的，是晏子提出“君罪民诛”的说法。在一次与齐景公争论中，晏子公然提出：“疏者（关系疏远的）有罪，戚者（关系亲近的）治之；贱者有罪，贵者治之；君得罪于民，谁将治之？敢问，桀、纣，君诛乎？民诛乎？”（内

篇谏上,本书 11 条)君功民颂,君罪民诛,对暴虐君王,人民可以起来诛灭他。晏子的这一主张,真是振聋发聩。打倒这种君王,为的是国家,君并不代表国,忠于国家与忠于君王不是一个概念,晏子这里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。

纵观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,贤者能人各投明主,屡屡奔走各国,朝秦而暮楚,“东方不亮西方亮,黑了南方有北方,此处不留爷,自有用爷处”,这时,没有任何人强调君主即国家。“朕即国家”是后世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,“忠君即爱国”正是这种产物的宣传,这种观念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,而晏子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,是应该发扬光大的。

八

关于本书的编撰。

《晏子春秋》虽不是晏子本人所著,但以其它古籍佐证,此书基本上准确地反映了晏子的思想,正确地描述了晏子的形象,真实地记录了晏子的活动,因此,该书可称重要古籍文献。

身为大臣多年的晏子,从国家政治与社会现实出发,实事求是地提出各项政策、处理各种问题。他的实践,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思想;他的理论、政策、观点,给后人以重要启发;他的不少言论为后世所传习,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转化为成语,如挥汗如雨、南橘北枳、城狐社鼠、狗猛酒酸、众口铄金、屣贱踊贵、二桃杀三士、挂羊头卖狗肉、衣莫若新人莫若故、富而不骄贫而不恨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,等

等。

《晏子春秋》的体裁可称是人物传记故事，全书均为一篇篇独立的表现晏子思想、观点、态度的故事，这在中国古代传记体裁中也是较早的作品。但是，这种体裁却并不妨碍其语言的简练、思想的深刻、表达的纯熟、观点的明确，这正是先秦文章的特点。因此，《晏子春秋》流传不绝，其中如晏子使楚、二桃杀三士、晏子哭庄公等甚至脍炙人口。晏子以其聪明敏慧和极有口才闻名于后世，正是《晏子春秋》描写的结果。

晏子对先秦诸子影响巨大，几乎同时的孔子就曾多次称赞晏子，对这位年长二十岁的晏子，几乎以父兄视之，仅《晏子春秋》一书中就记载孔子称赞晏子语九处，墨子称赞晏子语两处。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中，司马迁甚至动情地说：“假令晏子而在，余虽为执鞭，所忻慕焉。”管仲之才、晏婴之贤，齐国这两位名相，在中国历代诗文词曲小说中，屡被称颂，这是有原因的。

出于对晏子的敬重和对《晏子春秋》的喜爱，我把这位可称是先秦诸子前辈的政治家、社会活动家也列入了“十子名言译评”系列。仅以《晏子春秋》为素材，即从中节选开列出148条名言，依全套10册的统一体例，每一条均加译文、注释和评论，而对每一条评论都力争把理解与思考奉献给读者。

掩卷而思，可以自感欣慰的是：第一，这是关于晏子和《晏子春秋》的一个好读本。一册在手，晏子在握，精华及重要内容无遗漏地皆在此。第二，译文在力求准确的同时，要求符合当代标准化汉语；注释也做到了必需和简练。